周作人与《圣经》

■顾 钧

在1922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周作人的态度和行为非常引人注目,他站在了这次运动的对立面,也站在了陈独秀、蔡元培等“五四”同志的对立面,更联合其他四位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公开发表由他起草的一篇《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晨报》1922年3月31日),明确说明自己“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此后周作人在这一问题上与陈独秀、蔡元培等又进行过公开的辩论,但主张思想自由的基本态度没有变化。所以近贤对于周作人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往往多从他的自由观这一角度来研究,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一问题也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周作人与基督教的关系,特别是在文学这一层面的关系就很值得研究,因为周氏虽然博学多能,广有建树,但此时文学乃是他的看家本领,也是他思考和研究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一

《圣经》既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也是文学经典。《圣经》的译本曾经对欧洲的语言文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圣经》的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但在整个中世纪,拉丁文本(vulgate)却是最为通行的文本,是欧洲思想文化的最大根源。宗教改革之后,各种欧洲语言的翻译文本纷纷出现,特别是英文、德文译本曾对英语、德语语言文学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圣经》的中文译本虽然对中文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圣经》的白话译本,尽管翻译者主要是出于扩大传教对象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为文学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白话文学的范本。正如周作人在1920年的《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所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豫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在周作人写这篇文章之前,《圣经》译本中的语言和意象已经出现在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等“诗界革命”参加者的作品中,但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到过的那样,这种影响还是浅层次的,往往是个别词语的寻▮借用。在周作人看来,《圣经》中译本与中国文化“极大极深的关系”,首先还是在思想方面,周作人一再强调,文学革命是两方面的革命,即语言方面和思想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的观点一致,而与胡适更多强调语言的观点有一定的分歧。

就思想方面来说,周作人认为“五四”新作家追求的信仰应当是人道主义,创作的文学应当是人道主义的文学。一般认为,希腊文化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源头,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也是“言必称希腊”,但是希伯来文化同样也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对此周作人有孤明先发和深切详明的认识:

希腊思想是肉的,希伯来思想是灵的;希腊是现世的,希伯来是永生的。希腊以人体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神便是完全具足的人,神性便是理想的充实的人生。希伯来以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成,所以偏重人类所分得的神性,要将他扩充起来,与神接近以至合一。这两种思想当初分立,互相撑拒,造成近代的文明;到得现代渐有融合的现象。其实希腊的现世主义里仍重中和,希伯来也有热烈的恋爱诗,我们所说两派的名称不过各代表其特殊的一面,并非真是完全隔绝,所以在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及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已有了融合的端绪,只是在现今更为显明罢了。

两希文明并非完全水火不融,基督教之所以能从最初简单的伦理原则演化成严密的神学体系正有赖于教内人士对古希腊哲学的运用。在人道主义的观念上,它们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希腊人更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和尊严,而基督徒更看重对人的爱和尊重。周作人显然认为,这两种人道主义都是中国人所缺乏并需要大力引进的。

希伯来文化更重来世的幸福,但也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世的幸福,热情奔放的《雅歌》就是明证。这首爱情诗尽管是经过重新诠释后(说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在那里咏叹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才被收到正经里去,但这也说明,禁欲的思想是后来的基督教发展出来的,与原始的希伯来文化精神是有所违背的。《雅歌》中有这样大胆的描写:

你的肚脐如圆杯,
永不缺乏调和的酒;
你的肚腹像一堆麦子,
周围有百合花。
你的两乳像一对小鹿,
像双生的母羚羊。

这样的诗句即使是放在古希腊也是会让人惊叹的。周作人对于这一类的诗歌非常激赏,认为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古人对于情诗的态度非常极端,要么是“太不认真”,要么是“太认真”,缺乏一种真切自然的态度,这也正是他在中国文学中极力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晚明文学的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对西方文学了解的深入,中国文学中欠缺和不发达的文体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于是文学革命的提倡者陆续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话剧等引入中国,以期弥补中国文学的缺陷,周作人的主张也属此类,而且事实也证明,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学确实对诗歌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

周作人1901年9月到南京读书后正式开始学习英语并接触到钦定本《圣经》和《圣经》的中文译本,其间他还根据《旧约》里的夏娃故事,给《女子世界》写了一篇《女祸传》,此后他的身边经常带着《圣经》,对于它的重要性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五四”前后周作人在多篇论文中对于《圣经》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进行过深入精辟的论述,如在作于1921年7月的《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中他指出:

《旧约》里纯文学方面,有两篇小说,都用女主人公的名字作篇名,是古文学中难得的作品;这便是《以斯帖记》和《路得记》。……《以斯帖记》有戏剧的曲折,《路得记》有牧歌的优美。两个女主人公也正是当时犹太的理想中模范妇人,是以自己全人供奉家族民族的人,还不是顾念丈夫和儿子的贤妻良母,更不是后来的有独立人格的女子了。

将《以斯帖记》和《路得记》作为小说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不但故事有一定的长度和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有完整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按照这个标准,《旧约》中除了《以斯帖记》和《路得记》外,《约拿书》也可以放入小说一类,只是它的主角是男性。

作为欧洲文学研究专家,周作人可以说是最早强调《圣经》文学性的现代中国学者,同时他对《圣经》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地位也有清醒的体认。周作人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可以说已经是文学史的常识,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却是非同寻常、非常新颖的。当然,这些深入、新颖的观点并非全是他个人的观点,对此他也从来不加隐瞒,如他在文章中就不止一次提到美国学者谟尔(George F. Moore)所著的《旧约之文学》,显然是他的案头之书。然而当时能够阅读这类参考书的人在国内也是凤毛麟角。

周作人对于欧美学者很早就将《圣经》作为文学来研究的做法也非常欣赏,并认为这对中国学者非常具有启发性,因为“中国的经学不大能够离开了微言大义的”。确实,中国历代的学者、选家从来没有、也不敢这么做,只有当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孔子和其他诸子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之后,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才尝试将《论语》《孟子》作为先秦散文作品来看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周作人将儒家经典和《圣经》进行比较也就具有了某种开创性的意义:

《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纪》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申命记》与《书经》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

这种文学上和文化上的比较可能显得比较粗糙,但无疑具有启发性,特别是《哀歌》《诗篇》和《雅》《颂》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此外,古代的《圣经》学者和中国古代的经师在阐发经典的微言大义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前文提到的关于《雅歌》的解释与关于《关雎》的解释就大有“人同此心”的特点。也许这种比较的意义还不在于具体的问题本身,它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无疑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之一。

三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反基督教的事件,原因多种多样。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思想背景之一是科学主义的流行。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是当时唯科学主义的主要思想后盾。周作人在南京和日本时期都学过现代科学,但并不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后来弃科学而从事文学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与鲁迅一样,他认为根治人心是更为重要和急迫的事业,文学是手段之一,宗教也是手段之一。

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研究家,周作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过深入考察后发现,“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所以宗教虽然与科学不合,但与文学却有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是如此,对此他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这可以说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托尔斯泰著的《什么是艺术》,专说明这个道理,虽然也有不免稍偏的地方,经克鲁泡特金加以修正,(见《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内第二章《文学观》)但根本上很是正确。他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这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合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

《圣经》对于西方作家来说,确实是一部“伟大的法典”(The Great Code),不理解这部法典,就无法理解西方的文学。“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匪浅。

“隐元豆”与“菊舍句碑”

■钱婉约

到位于京都南郊宇治市的万福寺参观,是在2011年11月14日星期一的下午,当时洛南秋色正好,层林尽染。京都,这个仿唐代长安建造起来的日本古都,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洛”,所以,“洛南”、“洛中”、“洛西”等名称,相应地也为追慕唐风的古雅人士所爱用。不用说,中国人用起来,就更加倍感亲切。

万福寺,其实已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还是在十五六年前,印象不是很深了。这次再来,有一种补课的心情,如果再不写点什么,感觉有负此行。那就特别地说一说万福寺里著名的“隐元豆”和“菊舍句碑”吧。

宇治万福寺是清顺治年间从福建渡海而来的隐元隆琦禅师(1592—1673)创建的。隐元禅师本是明末福建福清地方“黄檗山万福寺”的住持,60岁开外时,受长崎闽浙移民的邀请,渡海来到中国人集聚的长崎主持当地“兴福寺”寺务。隐元博学多才,佛学外,还精于建筑、医药、诗文、书法等,到长崎后,受到后水户法皇和第四代德川将军家纲的尊崇,德川将军专门将京都宇治醍醐山麓一片土地赐给他建造伽蓝。隐元便按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规模样式,于1661年建成了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现在我们看到的万福寺,还都是隐元创建时的样子,在寺庙配置格局、建筑物风格、甚至松柏黄檗的种植等方面,完全按照明朝禅宗伽蓝的样式。漫步在松柏森然的万福寺境内,23间殿堂禅房有长长的回廊连接贯穿,随处可见隐元和他的传人木庵、即非等中国高僧亲笔题写的楹联和题额,回廊映衬秋色,联额古色古香,仿佛当年摸样,令人不由得发思古之幽情。

在万福寺众多楹联中,山门两侧字迹斑驳,依稀可辨的,是这样一副长联:

『隐元豆』『禁烟』(木质)

地辟千秋日月山川同庆喜
门开万福人天龙众任登临

可谓开宗明义,表达了中国高僧无论中土东瀛,不问富贵贫贱,广开福地,普度众生的情怀。

终于可以说到“隐元豆”了。

过了天王殿,在通往伽蓝堂和斋堂的路边一侧,一片篱笆墙上藤蔓茂盛,绿叶间零星开放着紫色的小花,两块木牌,分别赫然写着“隐元豆:三百五十年前隐元禅师从中国传来”、“重要文化财禁烟”。再细看,篱笆豆架上还真结满了豆角——就是江南人叫做“扁豆”的那种扁扁短短的豆角,有鲜嫩的浅绿色,也有偏老的黄白色。这一架豆角,可谓是活着的标本。记录着几百年来,隐元开辟日本黄檗宗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也印证了日本人对隐元禅师东渡传法、沾溉群伦的缅怀。“隐元豆”至今仍是日本家喻户晓、日常餐桌上常见的菜蔬之一,与“唐三彩”、“唐纸”(宣纸)等名词一样,铭刻着中日物质交流的一段过往历史。还有由黄檗禅僧在万福寺推广的“普茶料理”,即面对普通民众,以蔬菜、芝麻、豆腐、植物油等为主料的素食,也已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喜爱。

在山门处拿到的日文和英文本《万福寺导游图》上可看到,这样全然保存着创建之初的中国风格的禅宗寺院,在日本,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万福寺被指定为日本国“重要文化财”。在大雄宝殿背后的法堂里,我们有幸亲眼得见、亲耳聆听了一场寺内僧侣的诵经法事:十来位身穿黑色、蓝色或灰色法袍的僧人,在一位年龄稍长的师傅十分有节奏的木鱼敲击声带领下,高声诵念经文。据说,万福寺佛事的仪式和作法,也一依明代禅林的制度定式,每日诵经的发音都是“黄檗唐音”,继承了明代的“法式梵呗”。我们恭恭敬敬地站在法堂的一角,足足聆听了十多分钟,被铿锵的木鱼鼓点、朗朗的诵经梵呗以及僧侣们虔诚饱满的情绪所感染。但是,说实在的,僧侣们用的到底是中国语还是日语发音?我们一行人无论如何还是不知所云,至于诵的是哪部佛经,就更不明白了。

在隐元禅师创建万福寺130年后的1790年,也就是江户宽政二年,万福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日本僧尼——美浓派著名俳人菊舍尼。她在万福寺写下的一句著名俳句,被两处镌刻书写在一进三门左侧的路旁,一为木质的,一为石质的,所谓“菊舍句碑”是也。俳句是这样的:

“山▮を 出れば日本ぞ 茶摘み▮ ”

(一跨出山门 满耳采茶的歌谣 是我日本啊)

宇治万福寺内的“菊舍句碑”(木质)

说起来,这位女诗人原是山口县下关市人,16岁嫁给附近的村田家为妻,24岁时因丈夫去世,未有子嗣,返归娘家。由于她热衷俳谐之道,倾慕松尾芭蕉,而且在汉诗、和歌、琴曲、书画、茶道等方面也颇有修养,于是出家为尼,开始了游走四方、广交文人墨客的行吟生涯。这句俳句,记录了菊舍38岁初次拜诣黄檗山万福寺的心情。在这个完全唐风的寺院里,女诗人为耳闻目接、处处都是的中国式景色和氛围所沉醉,一跨出山门,突然听到大和国宇治茶园飘来的采茶歌谣(宇治正是日本茶的重要产地),顿时涌起回归日本、回归自我的感觉。我反复吟哦这五七五的短诗,体味着女诗人寄寓其中的意趣:是赞赏陶醉于寺院古色古香的中国风?还是欣喜于眼前活色生香的大和国原野?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正是这短短的17音,准确刻画了诗人跨出山门这一瞬间情感的精妙变化,让它成为万福寺传诵不绝的经典之句吧。

漫步在万福寺中,我不由得想:这“隐元豆”和“菊舍句碑”,穿越历史的烟云,印证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把它们看作万福寺的名片,应该不为过吧!

本版推荐

阅读冰波的十个理由

■张天明

冰波经过一番磨难,睿智、幽默、热情丝毫不减,他属于读者,属于这个时代,他的名字将载入儿童文学发展史,成为儿童文学发展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人曾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国民的阅读水平。2012年开年之际,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新鲜出炉的“冰波童话”系列作品,像面包一样散发出迷人的香味。我想这些童话已经,并将继续陪伴孩子们的童年,带给他们温馨美好的回忆。冰波是当代童话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代表了文学的品质和纯粹。我认为阅读并爱上冰波童话,至少可以举出十个理由。

一、在一切文学样式中,童话是最具想象力的文体。童话把奇异的想象力、美妙的心愿、善意的爱惜种植进孩子的脑海,并附入他们的生命。所以,阅读童话对孩子来说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孩子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自我发展的需要。

二、冰波人生的传奇性,让他的作品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孙建江老师如此为冰波做传:“冰波。杭州人。左手西湖右手西溪。水气氤氲。抒情派童话领袖。屡获大奖。电脑高手。超级玩家。绝顶聪明。乃不多见才子。奇妙复合之体。作品可清丽柔美亦可风趣幽默。为人慷慨大方。为文斤斤计较。好友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职场中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中年大病。九死一生。彻悟要做回完全的自己。赞。”在浩如烟海的童话作品中,选择阅读冰波,就如在茫茫大海中,选择了一盏航灯,一片光明。

三、冰波童话是心灵化写作的代表。冰波极其重视内心体验,他的《小青虫的梦》《晚安,我的星星》《窗下的树皮小屋》等作品,均温婉、细腻、凄美,是在情感内驱力的激发下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而另外幽默风趣、情节跌宕,颇具喜剧效果的童话,皆因世态见闻逼上他心头编织出的故事,表现了他对外部世界的关注。

四、冰波被方素珍称为“五百年难得一见的才子型作家”。高洪波老师也说:“一个江南文化浸泡过的才子式的作家,没理由不让人读出一篇篇的意外和惊喜。”冰波遵循儿童是审美情趣巨人的理念,将永恒不变的人性置于当代的故事背景中,展示丰富的人物内心世界。这些独到的创作观,深刻地指引着冰波将童话变成浅语艺术的典范。

五、冰波不断超越自我、挑战新事物的能力和姿态,也属罕见。冰波是一个勇于探索,不想重复自己,并想不断超越自己的作家。他躬行实践,求新求变,一路行走,一路风景,凭着他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睛和一颗善感的心灵,拥有了《窗下的树皮小屋》、《阿笨猫》、《小神仙和小仙女》、《毒蜘蛛之死》、《狼蝙蝠》等系列名篇佳作,并先后斩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重要荣誉。

六、冰波童话包含200多部作品和数百集动画片,读者覆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各个年龄段,包含“绘本系列”、“桥梁书系列”、“注音系列”、“中篇系列”、“大长篇”、“动漫系列”等5大子系列,显示出足够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七、冰波童话主题多元,包含动物童话、精灵童话、科幻童话、小山神等中国元素童话等,并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形象,如“阿笨猫”、“狼蝙蝠”等,是中国童话原创力的代表。

八、引领性。文学与动画的结合,微童话的创作,都是领先业界的创举。在童话创作领域,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九、冰波作品的影响力巨大,郭敬明作为冰波老师的忠诚粉丝,对《毒蜘蛛之死》尤其表现出情有独钟,他说:“《毒蜘蛛之死》像是一滴因为幸福而留下的眼泪,也像是一抹因为痛苦而绽放的笑靥。”在少年时代留给他的那种类似暗夜力量的震撼至今萦绕于心,甚至大大影响了他后期的创作。

十、童话如人,人如童话。我们阅读冰波,还因为其作品弘扬人性美,弘扬善良和爱,教会孩子们如何做人,为他们的童年打下精神健康的底子。

所以我们阅读冰波,阅读童话,可以举出10个、100个理由来,让我们走近大师,阅读童话,读经典的书,做高贵的人。